

■ 李忠杰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又考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史专业,成为中央党校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199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1996年成为中管干部,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7年。2003年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几十年来,“双肩挑”是我的工作常态,所以很多人称我是学者型领导和领导型学者。能不能把两副担子挑好?我给自己提出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要求,对我的学生和部下也是这样要求的。三个“做”,简洁明了,但包含很多内容,真正做好更不容易。多年来它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实现三“做”辩证统一,是我一直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和境界。

### 做人:做正派的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

在我看来,无论在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首先都要把人做好。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或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我觉得做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这也是对我的自己的要求。

首先是要做一个正派的人。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派,如苏洵《用间》所说:“守正为心,疾恶不辜;用心于正,一振而群邪举;用心于邪,百补而千穴败”。领导干部要正派,学者也要正派。领导班子中如果有一个不正派的人,这个班子就不得安宁,一个学者特别是搞思想理论的学者如果不正派,就会破坏学术环境。所以,无论作为干部、还是作为学者,我都注意修炼人品,严格要求自己,坦诚对人,与人为善,不与别人争名夺利。只有把人品修炼好,才能树立一个好的形象,才能以人格的力量团结大家,赢得大家的尊重,也才可以与他人合作,有利于开展工作。

其次,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从年轻到年老的几十年间,我不变的初心,就是社会责任感。生而为人,来到世上走一遭,总得为社会做点事。比如,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开展了《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重大课题的调研,通过搜集档案资料和走访等,更加清楚、准确地掌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这个工作是我们当时从国家发展、国际斗争的现实需要主动提出来的。我们把它当作“基础工程、精品工程、警世工程、传世工程”来抓,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项调研历时11年,先后有60万人参加,最终成果汇聚成200卷的丛书,把当年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以确凿的事实揭示出来。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项调研工作,多次作出批示,认为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是社会责任感,对国家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从2006年至2014年,我还组织党史部门对全国革命遗址开展大规模普查,为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对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加强红色基因的赓续和传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做人,还要有开阔的胸襟,善于与他人友好合作。当学者的,往往会有很强的个性,组织和单位对此不必苛求。但我做领导工作,就深深以为,这种个性和脾气很不利于团结同志、做好工作。所以,我一再要求自己的博士生,“志当存高远,立意做小事”。在领导班子里,在学术环境中,我始终“寻求最大公约数”,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正确看待自己,多看到别人的长处。只有具有团队精神,吸收他人长处,懂得互利合作,才能使一个团队有积极向上的风气。

### 实践探索

■ 范铮 李启正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以文化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是浙江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文化价值深度转化为核心,以优化空间政策保障为基础,以建强人才队伍为根本,持续探索县域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的有效路径。

#### 浙江的探索与成效

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在县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将文化深度融入县域经济社会肌理。

一是推进文化要素的系统化激活与价值重塑。通过实施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基因解码工程”等基础性工作,对全省文化元素进行了系统性普查、解码与数据库建设,深入挖掘地域文化标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并着力培育其成为可识别、可转化、可交易的文化IP,并同步推进县域文化品牌建设,依托文化内涵提升品牌溢价。

探索文化与产业融合的新模式。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三生同步、三产融合、农文旅共富”的特色发展范式。深化“万村景区化”工

# 做人、做事、做学问

几十年来,做人、做事、做学问,一直是我的座右铭。这三个“做”,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做人,就是要把人品修炼好,做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一个有团队精神的人;做事,就是要能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做对人民对国家有用有益的事;做学问,就是要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做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

### 做事:做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要做点事情的。这既是人生的主要内容,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从大学开始,我的人生选择就是做学问,从来没有想要当官。但因为工作需要,还是一步步担任了领导职务,先后在中央党校国际工运史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政法教研部、科研部担任领导职务,1996年起任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成了一个学者型领导。后来又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干了12年。

既然当了领导,就要在其位谋其政,对得起这个领导岗位,为单位、为社会、为国家多干点好事。我把做事当作自己的人生第一要务,做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做对人民对国家有用有益的事。

在中央党校时,我作为校委成员参与涉及全校的行政领导工作,负责中央党校的科研管理和党校系统的科研指导。曾参与筹备中央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参与组织中央部署的“党的工作机制”问题等多场调研工作,组织全国多所省部级省级党校进行重大课题的调研工作,等等。1997年9月,我当选为十五大代表。在参加十五大期间,由大会新闻组(外宣办)安排,召开中外记者吹风会,向50多名中外记者介绍邓小平理论的情况,回答了美联社、路透社和台港澳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岗位上,我积极推动对党代会会址的保护、修复、展示工程,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的党代会会址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修复,并成功布展开放。

研究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它看似是“向后看”,但根本目的是“向前看”,重温历史就是要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为当前的进步注入动力。2004年,我向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在2005年组织大规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建议邀请参加过抗战的外国友人、国际共产党人士以及外国政要参加活动。这次活动除了外国政要没有邀请之外,其他都实现了。除此之外,我还参与组织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节点的纪念活动。比如,2006年,参与庆祝建党8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筹备工作;2010年牵头筹备了中央部署的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座谈会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探索和自身建设过程中,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占有重要的地位,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经验教训。无论是记录历史还是纪念历史,都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伴随着认识的提高、研究的深入,对这些历史性事件作出最新、最全面、最权威的评价,以便从中汲取深厚的营养、智慧和力量,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这些事的重要特点,既是行政领导工作,又是学术研究工作,两者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所以,它既锻炼了我的组织领导能力,也提高了我的学术研究水平。现在回顾,感到幸运和满意的是,所有这些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也就是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和要求。

### 做学问:做有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

在诸多身份中,学者始终是我最初的底色。我热爱做学问,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我人生中更重要的任务。从古至今,文明需要延续,也需要创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切物质性的产物都会随风飘散,唯有人类文明生生不息。作为一名学者,应该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是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做学问需要有注释,但主要不是做注释,更不是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我做学问的一个特点,是经常做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得益于中央党校这个平台的熏陶,我培养形成了关心大局、注重实践、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风格和精神,并且通过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能及时站到学术探讨的最前沿,准确判断哪些研究是有价值的,哪些研究只是老调重弹,从而善于选择那些走在前沿的课题进行研究。

从大局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局势急剧变化,对世界、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随时掌握苏东局势的发展变化,中央成立了一个苏东局势研究组,我也被抽调其中,及时跟踪、研究苏联东欧的局势变化,向中央提供形势分析和对策建议。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很多形势分析会议,参与起草了各项研究报告,加上自己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学术基础,对苏东局势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清晰的判断。1991年5月,我向中央提交了《苏联将以何种途径摆脱困境》的内参,明确提出苏联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但不会成功。8月19日,苏联果真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变也确实没有成功。

从前沿来说,万事万物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前进,做学问不能刻舟求剑,而是要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探寻规律,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我在长期思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理论。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平衡机制》一文。这个理论,简单说,万事万物的运动都需要有两种机制,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保持动力与平衡之间的相对平衡。社会需要有动力,才能前进。社会也需要平衡,才能稳定。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必须把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结合起来。

这个理论是认识和解释当今中国和世界各种社会问题的一把钥匙,是评价鉴定治国理政效果的基础性标准。它也从深层次上揭示了我国社会变迁和改革开放及其成就的最根本原因和机理。中国的改革开放解决了计划体制下社会平衡有余、动力不足的问题,把人的利益与其行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激发内在动力去革新、去创造。但社会活了,对社会原有的机制和秩序是一个冲击。社会的组织程度相应降低,因此,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乱的现象。因此,必须把握好动力与平衡的关系,着力建设和完善动力与平衡相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

时常有人问我,你是搞什么专业的?我不太好回答,只能说,你看看我写的东西吧。几十年来,我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是很多的。论文在20年前统计就有600多篇了。现在没有统计过,估计超过1000篇是没有问

题的。出版的个人著作,仅党的十九大以来就已经有20多本。这些著述涉及很多学科和领域。由于我后来的工作在党史部门,所以一般人人都说我是搞党史或党建的。其实,我在中央党校带的博士生,是国际政治学、国际战略方向,同时,还协助龚育之老校长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博士生。

这就涉及做学问是通还是专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既要有专才,也要有通才。专才钻得深,但通才也普遍需要。我的通是根据主观和客观条件决定的。通有通的好处。研究历史,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讲理论课,可以用历史事实来说明;研究中国,可以用国际做参照系;研究国际,可以为中国提供对策建议;研究理论,可以指导现实;关注现实,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

除了要求自己,我也鼓励学生做前瞻性研究。只有走在时代前面,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有现实意义。我曾指导博士生写过一篇《世界恐怖主义及其对策研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放在今天,选题并不稀奇,但我的学生是在“9·11”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完成了博士答辩,论文对世界恐怖主义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分析,它成了中央党校获得的第一篇,也是迄今唯一一篇“全国百篇博士优秀论文”。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世事沧桑是我或困顿或进步的大环境。我从来没有指望“天上掉下馅饼来”,而是坚守自己的人格,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下功夫,在实干和努力中创造未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现在,做事的机会不多了,做学问则是我的乐趣。我希望自己仍然能保持灵敏的学术嗅觉,在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中,思考更前沿的问题,用手中的笔记录时代变迁,用总结提炼的理论推动社会发展。

#### 名家小传



李忠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首席专家、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党的基本理论、党史党建、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出版有《社会主义改革史》《与世界对话》(中英文)等数十本著作;主编有《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丛书》《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成果丛书》等;近年新著有《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党章内外的故事》《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英文)《改革开放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通览》《中国扶贫脱贫史》《世界向何处去》《走向现代文明》等。



扫一扫 看视频

### 之江政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省委十五届七次全会以《决定》形式对建设创新浙江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彰显坚定不移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高度自觉,进一步巩固拓展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创新的分量愈发重要,人才工作的作用更加凸显。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创的底层逻辑正在悄然变化。“杭州六小龙”等科创企业崛起和现象级科创成果出圈的密码,正是一大批科技型企业、技术极客、卓越工程师在其中挑大梁当主角。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质量结构、核心素质等都赋予新的定义内涵,更加强调具备创新思维、跨学科能力和AI技能,能够引领未来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赢得主动。在创新浙江建设中,必须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布局人才链,在“得人”上下足功夫。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才工作理念之变、格局之变,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方能牢牢掌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动权。在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需要更好把握人才培养规律新的内涵要求,聚焦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凝练培养方向,贯通高校、科创平台和企业研究院,加强人才长周期、全链条、交叉人才培养。在这方面,各地有不少创新探索 and 有益实践。比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探索开展“新工科教育”,完全打破学科壁垒,跨学科设计专业方向和学习计划,与华为、比亚迪、大疆等知名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打造18所特色产业学院,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创新、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比如,宁波工程学院与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团队共同创办了机器人学院,紧扣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智能物联网等产业加快打造应用型人才。这些做法的核心理念就是深化推进科教融汇、产教协同,构建学科交叉、知识交叉、能力交叉的全方位多维度新型培养模式。

人才有序流动起来,创新活力才能竞相迸发。当前,我省积极探索“企业出题、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的“四题一评”新模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此推动“两新”深度融合。推行“四题一评”,人才有序流动是关键一招。今年以来,省市联动开展人才校(院)企双聘改革试点,探索“编制在高校、工作在平台、服务在企业”等用人模式,推广“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目前已跑通25个案例,做到“一个案例就是一条路径”。同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人才难以以论文、职称等传统标准来评价。推行“企业认定、政府认账”,正是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有益探索,只要企业认定是人才、敢于给高薪,政府就把该给的人才政策兑现到位,这一做法深受企业和人才欢迎。

有组织科研是推动创新的重要模式,主要是以帅才型人才领衔,推进大兵团协同攻关。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在科技攻关中,还不同程度存在资源配置分散、组织管理僵化、成果转化效率偏低等问题,体制机制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围绕产业发展方向和关键核心技术,健全创新需求凝练机制,选拔和支持领军人才跨体制跨行业跨单位整合资源、组建团队,进一步完善“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的结对合作机制,探索“一呼百应”的组织动员模式和“一事一议”的资源调配方式,不断提升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的能力和效率。

创新支撑发展,人才赢得未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部署上来,紧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着力优化集聚人才的氛围、机制和生态,激励引导各类人才竞相奔腾、大显身手,为建设创新浙江积蓄澎湃动能。

(本文转载自省委组织部《时代先锋》杂志2025年第7期榜首语)

### 新书推荐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何善蒙的新书《杳杳寒山》近日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以中国唐代著名的隐逸诗人寒山为引线,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与分享。主要叙述了诗人寒山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其生平与创作历程;记录了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等与寒山的隔空对话与诗词追忆;阐发了作者对寒山诗作艺术成就的探究及其精神世界的探幽;介绍了寒山诗作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以及对今日、今时、今人的启发和教育意义。这本书将带领读者一同踏上跨越时空的“和合之旅”。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浙江理工大学)